

北京大学图书馆 / 组织编写 张红扬 / 主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西文汉学珍本提要

Western Rare Books on China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图书馆 / 组织编写 张红扬 / 主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西文汉学珍本提要

Western Rare Books on China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 / 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编写; 张红扬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633-8396-2

I. 北… II. ①北…②张… III. 外文—汉学—内容提要—中国 IV. Z89: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31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30 字数: 200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500 册 定价: 1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特邀顾问及序言作者：张广达

顾问：戴龙基 朱 强

主编：张红扬

审稿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立新 王 军 龙 云 沈正华 李昌珂 张 雄 张红扬 孟 华
查晓燕 穆 风

撰稿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玲玲 王 浩 王新青 李声凤 吴天岳 吴允兵 闵雪飞 张明明
张丽静 张红扬 范 鸿 杨 莉 邹新明 郑心闲 徐龙飞 郭 晖
蒋刚苗 霍 英

序言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的问世，是对当今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莫大贡献。这一解题目录对北京大学百年来的西学积淀作了颇有深度的揭示，其中包含的信息和资料对于西方汉学研究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有诸多特点。例如，入藏年代早，一些特藏始自190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和后来的老北大，入藏的年头已过百年。又如，融入北大的西文藏书源出多头，因而内涵丰富，兹举其荦荦大端：1928年之后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同步形成的燕京大学“西文东方学”特藏，1945年二战结束后到50年代初，被相继接收的德国人福克司（Walter Fuchs, 1902—1979）、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 1888—1956）等私人精品，之后又纳入原德国大使馆、原中德学会、原中法大学、原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藏书。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北大的西文藏书之语种多，涵盖面广等诸般特色。

今天，就珍本善本收藏而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收藏中自然不乏外文珍本善本。据顾麟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善本书目》（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该馆收藏西文善本1234种、日文善本299种、俄文善本420种。上海为中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因其地理位置而受西方文化浸润较早，一些西方人士和宗教机构长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并在上海建立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也相应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西文典籍。1992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目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收录了1515年至19世纪初出版的西文图书1831种。但是，这两本目录旨在将各自所有的西文珍本收藏做总体性描述，而非研究性专题特藏的揭示。

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西文图书中，最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其中20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书多达两万册，而图书的收藏往往因其专题性质而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如此珍贵的专题特藏由于缺少必要的介绍，即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难窥其全貌。此次北大图书馆从两万余种图籍之中选录了大多出版于1850年以前的300余种珍本善本，重揭其面影，并写出详细的提要，

再现这座难得一见的宝藏的一角。其版本不乏珍贵的首版本,其语种涉及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法文、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蒙元以来早期中国游记、明末以来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记录、汉满蒙藏维等语言语法早期课本与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和名著翻译、亲历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以及关于中国的总体和区域考察以及专题研究。翻阅一下目录,可以看到,从蒙元以来各种行纪,特别是17世纪中叶以后耶稣会士东来直到今天,反映早期从内陆和沿海来到中国的珍贵典籍各个阶段情况的代表性的西文典籍于焉大体具备。换言之,在国内,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藏书既富于珍本善本,又切合今天的西方汉学及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之用途。

本目录所附题名页上的各种藏书章,形象地再现了这一特藏的收集流程,在其背后,则是袁同礼、严文郁、毛子水、洪业、陈鸿舜、向达、梁思庄等几代北大和燕大图书馆人为此付出的毕生智慧和心血,他们的作用与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裘开明、吴文津相若。哈佛大学为了庆祝哈佛燕京图书馆七十五周年大庆而举办的特藏展并在2003年出版的一部展览目录《燕京宝藏》(*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北大图书馆的这部解题目录与之相映生辉。

本目录的编纂体现了今天北大图书馆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负责此项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主任张红扬女史及其同仁与北大各院系师生精诚合作,克服语种、版本等诸多困难,使本书得以完成,值得人们衷心赞美。在提要编写过程中,编者对所收录的图书在作者、版本方面进行了精心的核实和考证,厘清了一些原来编目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一种图书的不同版本和译本,以及原收藏者、印章、题签等重要信息都有较好的揭示,在提要编写方面也不乏独到之处。本目录的体例使人们想到John Lust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编写的《馆藏1850年前刊行的西方论述中国的注记书目》(*John Lust, comp., Western Books on China published up to 1850 in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1987, 1992年再版)。Lust做了统计,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这批图书大约相当于Henri Cordier的《中国学志》(*Bibliotheca Sinica*)著录的典籍的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这批珍贵的有关中国的西文特藏或许数量上赶不上世界顶尖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但质量上绝不逊色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研究性大学图书馆。这份文化遗产珍贵而沉重,它既见证光荣的过去,也昭示辉煌的未来。

如上所述,北大图书馆收藏20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图籍约达两万册,本目录不可能面面俱到。另外,北大图书馆除西文珍本图书,还藏有西

文珍贵期刊和报纸，如《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如能继续开掘，将有关馆藏悉数揭示，将为读者提供更大的参考空间。由此可见，北大图书馆的这一解题目录旨在创始，衷心希望它成为我国这一领域工作之嚆矢。

張廣達謹序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日

前言

红楼其神 燕园其魂 兼收并蓄 洋粹为鉴

——北大图书馆西文汉学珍本的收藏及研究

张红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中收录的330种珍本是馆藏2万册西文汉学收藏的精华版。这个珍贵的西文汉学收藏既融合了京师大学堂、红楼时期的北京大学以及燕京大学“西文东方学文库”中的汉学收藏，又吸纳了中德学会、中法大学等机构的相关旧藏，其中尤以燕京大学的汉学藏书数量为最多，收藏为最完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辛勤搜求、反复研读和精心守护，已成为嘉惠学林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来源及发展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其109年的辉煌而又艰辛的历史过程中，百年搜寻，几代求索，形成了如今40万册西文图书的规模。京师大学堂的前身之一——京师同文馆是最早的西文图书收藏机构。同文馆建于1862年，是我国新式学校之始源。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在1860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有“飭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之请，以备同文馆之需（《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在1887年的《同文馆题名录》中已有记载，同文馆的“图书馆”——同文馆书阁时有“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同文馆题名录》第四次，光绪十三年[1887]刊。见《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1902年同文馆归并到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藏书也归并于北大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同样自成立之日起就注意广为搜集西文书籍，曾通过请各国驻华公

使馆购书、派人出洋购书、请大学堂洋教习购书及请国外书商购买等方法采购西学图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京师大学堂档案》第38卷、100卷、135卷）。其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老北大图书馆更是注意收藏西学图书。据194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统计显示，当时书刊总量达到724894册（其中中文藏书达到530104册，西文藏书达到128104册），名列中国高校藏书量之榜首（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1948年）。

1952年院系调整后，燕京大学归并于北京大学，燕大图书馆的58万册书刊也归并北大图书馆，其中西文藏书约为12万册。在燕大的西文收藏中，有个著名的特藏——“西文东方学文库”。1933年编定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指出，这个收藏是“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的西文书籍”。至1933年，共有4279册。概况中还特别指出，“这个特藏中多为孤刻珍本，为燕大特藏之始源。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对于该类书籍，特加注意，数量与质量，都有一定增加。”燕大的工作统计表也把“东方学书”单辟一栏，以示区别，并将其中善本存放于特别图书室，此特藏为燕大图书馆的一大骄傲。在编目中，还特别在索书号上标注“O”，意即“Oriental Studies”。

燕大的这个特藏是因其完备性而著称的，而其中尤以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最丰富和完备。1938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出版了《西籍文献中之中国精选联合目录》（*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 Second Edition*）。它从美国的75个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中遴选出329种核心图书和21种期刊，由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史专家Charles S. Gardner编辑而成。这个研究会将此目录赠予燕大图书馆，燕大馆收到后即进行查重，发现仅缺4种。承担查重工作的图书馆员在每一条目后还特别用清晰工整的黑色墨水笔添加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索书号，以方便读者在本馆查找。

1952年新北大组成之后，继承和发展了燕大的这个特藏。它把老北大原有的12.8万册西文书中的东方学文献与老燕大东方学书籍合并，并不断添加新收藏，这个工作因“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干扰时断时续，80年代时，已计有1.1万多种，2万余册。“文革”中，这个特藏被打散进入大库，取消了其特藏的地位。2005年，北大馆将其一一从大库中提出，恢复了这个传统特藏并提供便利的对外服务，受到了校内外读者的欢迎。这个特藏除融合了北大和燕大馆藏外，还融入了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等机构的相关藏书及周慕西、方志彤、侯思孟等私人捐赠中的相关藏书。

有关西文珍本馆藏的相关人物及研究传统

饮水思源。北大图书馆西文汉学珍本收藏，凝聚着百余年来的赠书人及图书馆人的心血和智慧，它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珍本图书本身。

贝公赠书是“西文东方学文库”的源头之一。1933年编定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指出，西文东方学图书中最早收藏中的一部分“为前贝主教所赠”。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东方学的特藏中，还能找到165册有贝氏亲笔签名的书籍。

贝施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1849—1919)，是美国美以美教会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U.S.A.) 1904年至1919年间派驻中国的驻区会督 (Resident Bishop)。昔日燕大及今天北大的校长办公楼——贝公楼 (Bashford Hall) 就是以他的名字而命名。贝施福在他14年的中国生涯中积极倡导在华基督教各教派的联合办学，为燕京大学的诞生及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大学的水平的提升作出了贡献。为此，为燕京大学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司徒雷登校长特别同意以贝施福的名字命名校园的标志性建筑——校长办公楼。1998年，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出版的一部介绍中国13所著名基督教会大学的画册介绍文字中，也再次肯定了“贝施福促成了教派合并学校的谈判，而谈判的成功直接促成了燕京大学的诞生。” (Deke Erh & Tess Johnston. *Hollowed Halls: Protestant Colleges in Old China*. Hong Kong: Old China Hand Press. p. 1998)

贝施福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传教士汉学家。他写过200多种手册或文章，6本著作，《中国述论》 (James W. 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The Abingdon Press, 1916) 是他关于中国最重要的著述。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宗教、法律、历史、习俗、观念、信仰、迷信、自然、商业、教育，清末民初的政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与大多数传教士一样，贝施福有文化优越感，并认为治疗中国积弱的主要药方是基督教，但作为一个自由派传教士，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优势，中国文明是极其强韧的 (同上，43—72页)。他关于中国民族性的分析曾为中外著名学者所引用 (见大谷孝太郎，《现代支那人精神构造の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昭和十年 [1935]。沙莲香，《中国国民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中国述论》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他著述的目的在于“向西方阐释中国，也希望中国作家向中国阐释西方，相信这样一种交流能为和平、贸易进步和民族文明作出贡献。”贝施福在他的书中还提到，他来华之后，读过的有关中国的西文书就有500种之多。贝施福在美国逝世后，在华的个人藏书遗赠燕京大学图书馆。贝氏赠书不仅标志着北大西文汉学图书的源头，而且，他的关于“向西方阐释中国，向中国阐释西方”的观点也是体现了这一收藏的初衷。如今，这一收藏见证了欧风美雨洗礼之下汉学西渐

的过程，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吸纳和存取的历史。

言及“西文东方学文库”的管理和保存，梁思庄（1908—1981）女士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梁思庄女士是梁启超先生之女，1930年获得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曾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历任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燕大馆归并北大馆以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梁思庄除了精通英语之外，还通晓法、德、俄等语言，擅长西文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无论是对燕大图书馆还是院系合并后的北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编目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西文东方学文库”特藏，她亲自参与编目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期间，梁思庄还因此受到冲击。她的女儿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回忆道：“为了使图书数据能很好地为读者服务，妈妈不怕压力，坚持她认为正确的东西。她一贯坚持和保留使用‘东方学目录’（Oriental Books，简称O字书）和‘标题目录’（Subject Catalog）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由于妈妈坚持保留使用‘东方学目录’和‘标题目录’，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北大图书馆里顽固的守旧派’、‘前进路上的绊脚石’，甚至有人骂她是‘帝国主义的看家狗’等等。”如今，尘埃落定，玉宇澄清，览百年馆史，燕大和北大正因为有像梁思庄女士这样兢兢业业的图书馆员，百年来的珍藏才得以传承和发扬，成为滋养无数莘莘学子的丰厚人文积淀。

在西文汉学文献的收藏和管理之外，燕大馆人和北大馆人在西方汉学的研究领域也颇有心得及成就。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洪业先生、曾任北大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和向达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者。

洪业（1893—1980），号煨莲（畏怜，William），字鹿岑，福建侯官人。1910—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年回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并担任管理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1946年春赴美讲学。1948—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1980年在美国去世。

洪业先生曾在燕京大学开设“远东史”，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研究。授课时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一直叙述到晚清英国政局的变化等等，并用英文讲授。先生一生极为重视学术工具的利用。哈佛燕京学社

成立于1928年，是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以研究“东方学”、“亚洲学”和“汉学”为宗旨的学术机构。1930年，哈佛燕京学社设立了“引得编纂处”（Sinological Index Series），专门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而编印索引工具书，洪业任主任。此后的20年间，引得编纂处共编出经、史、子、集各种引得64种81册，成绩斐然。文献的考证也是洪先生所长。1935年，洪业多方考证了《方輿胜略》所附利马窦的《山海輿地全图》刊刻者及时间，撰成《考利马窦的世界地图》，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重视。留居美国之后，所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被推为世界汉学界诠释杜甫的权威之作，所著《蒙古秘史源流考》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大学讲授蒙古史的重要参考教材之一。为世界汉学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曾任职于北大馆而又对西方汉学文献研究有较大贡献者，当属袁同礼和向达。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是我国图书馆界第一代具有现代图书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袁同礼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英文甲班，与傅斯年和沈雁冰同班。1916年毕业后进入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工作。1920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负笈美国，插班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后又在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图书馆学。袁同礼曾三度与北大图书馆结缘。一是1923—1926年被聘为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二是1937—1946年抗战期间，曾以北平图书馆馆长身份兼任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三是抗战结束后，又以民国政府代表身份暂领馆长之职。袁同礼在中国现代图书馆管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主要是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主持工作的22年中奠定的，流传后世的主要著述则是1949年以后在美国完成的。而在北大担任目录学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的3年是他自美学成归国后重新踏上图书馆征途的起点，他的管理特色和学术兴趣，则在北大图书馆时期就显现了。

袁同礼首度结缘北大图书馆之时，正遭遇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政局动荡，经费紧张，甚至连个人薪俸也久欠不发。但他仍兢兢业业，勉力维持，不仅力图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而且清理了积压的大量西文书刊，编出了政府出版物目录一册、西文书目三册，显示了他对目录学和西文文献的兴趣。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

综观其一生，袁同礼始终对世界范围内中国文献的保存及研究极为关注，并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他的工作。一是查录散佚海外的珍贵典籍和艺术瑰宝。早在1924年就曾利用去欧洲考察的机会，探访《永乐大典》散佚欧洲的情形，后曾撰写《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等。他并托人多方查录英、法等国收藏的为斯坦因和伯希和掠去的敦煌资料。1935年，王重民在欧洲发现法国和普鲁士藏有国内缺失

的太平天国资料。袁同礼得知后即电请王重民拍摄，后由北大和北图共同辑成《太平天国资料》，以利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二是关注西方汉学研究状况，编著西方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学术性书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几十年中，由他个人编著并出版的主要书目有：《西方文献中之中国》（*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58）、《俄文文献中之中国》（*Russian Works on China, 1918—1960: in American Libraries*. Washington, 1961）、《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Washington, 1961）、《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Washington, 1964）、《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新疆研究丛刊》等，其中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最大的堪称《西文文献中之中国》。

袁同礼书目的副题名为“续考狄书目”（*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法国汉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曾于1878年出版《中国书目》，1924年又出版补编本。考狄1869年来华，两年以后担任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图书馆名誉馆长（Honorary Librarian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考狄书目是西方汉学史上首部完整的有关中国的书目，它系统地汇编了16世纪以来直至1924年几乎所有的以西方文字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原书加补编共有4500栏，鸿篇巨制，前后共花费了24年心血。袁同礼所编《西方文献中之中国》中的文献收录，正是始于1921年，与考狄书目首尾相接。

《西方文献中之中国》历时5年方告完成。它收录了1921—1957年以英、法、德文出版的18000种有关中国著述，以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受到西方汉学界的一致好评，成为西方汉学研究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美国汉学家、后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首任主任的恒慕义（Arthur Mummel, 1844—1975）在其前言中说道：“书目中所有条目都一一亲自考订其准确性，而非录自其他数据。为了防止缺失，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亚洲图书馆他大都一一访问到了。因此他的续编无论在语种还是年代的覆盖面上，都比任何一家图书馆要全面。”

如果说袁同礼的著述标志着20世纪初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西方汉学发展的兴盛，那么，解放后的北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向达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则将中西文化交流和西方汉学发展一直追溯至它的源头。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笔名觉明居士、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湖南溆浦人。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4

年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35年起，先后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巴黎的图书馆中，对散佚国外的敦煌莫高窟史料和其他珍贵历史文献进行收集和研究。1938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西域史专任导师，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大历史系教授。1941年和1943年，曾两次去敦煌莫高窟考察。向达教授毕生治学严谨，著述甚丰。对中西交通史、少数民族史、特别是对敦煌学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著作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艺术概论》等。

1949年解放后向达担任了8年的北大图书馆馆长，直到1957年。在任期间，他主持完成了北大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合并工作。在这一合并过程中，以向达为馆长的北大图书馆采用了原燕大图书馆的管理办法，在西文图书的编目方法上沿用了燕大的杜威分类法，而废止了北大原有的方法；在前燕大图书馆代理主任、合并后的北大图书馆副馆长梁思庄的通力合作下，不仅将原燕大的特藏“西文东方学文库”作为新北大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而且将老北大的同类图书合并归一，并加以发展，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文革”前夕。从而大大扩充了该特藏的品种和数量。

向达对“西文东方学文库”这一收藏的重视源于副馆长、老燕大人梁思庄的影响，同时也是基于向达本人对东方学和西方汉学文献重要性的认识。他对敦煌学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等始终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不仅对“东方中的西方”即中文文献中关于西方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及利用，而且对“西方中的东方”即西方文献中关于东方的记载及散佚于西方的中文文献广为收集、爬梳及借鉴。他曾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Sir Aurel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鞑靼千年史》（*E. H. Parker: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校注艾儒略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甘地自传》（*C. F. Andrew: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著有《元代马可波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汤若望进呈图像残存考》及《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等。向达著述甚丰，研究中中西（外）文献相互参见，力图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中诠释东方和中国，从而眼界较为开阔，正如他所说，他做研究志在“为中国中古史、交通史以及域外史之研究，另奠一合理的基础，进而与欧洲学者在中亚之历史考古研究取得联系，以提高吾国历史考古学者在国际学术上之水平与地位。”（向达：《敦煌考古通信》第十八封）。老北大、老燕大图书馆西方汉学文献收集和研究的传统，通过向达馆长在新北大得到了延续和光大。

*

*

*

北大图书馆西文汉学珍本收藏是优良的图书馆管理和完善的专题藏书建设的结合，它在形成中经过了人为的筛选、过滤、发掘和整理，体现了图书馆员的智

慧。燕大、北大图书馆人对它的研究促进了藏书建设的完备的发展，读者的反复使用和精心研读又使这个收藏的人文价值不断增值。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海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发展，原因在于不少西方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中国学术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北大馆藏西方汉学珍本也因此越来越为学术界所瞩目。为更好地揭示这个历史珍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西文汉学珍本提要》一书择入330种珍本，一一撰写提要，并详细说明包括版本、藏书章、馆藏复本、中译本和其他语言的译本、作者中译名、书名中译、作者简介、插图、北大图书馆索书号等信息。故而，本书是对西文汉学珍本收藏的回顾、总结和揭示，也是对北大图书馆百年以来西方汉学收藏和研究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期待本书的出版能带给人们更多的启示。

编撰说明

1. 收录范围

本书收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330种以西方文字出版的汉学著述，其中1800年及以前出版的珍本共93种，其余收录珍本的出版年代也多在20世纪初以前。

“西方汉学”一词在本书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指称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和有关中国的著述。本书收录的西文珍本涉及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共9种文字，其中英文182种、法文92种、德文23种、拉丁文13种、意大利文8种、俄文6种、西班牙文3种、葡萄牙文3种、荷兰文1种。择入珍本的主要依据为出版年代，但内容、版本和图片价值等也是考虑因素。

2. 编排体例

本书正文按照著者姓名排序，同一著者的不同书籍按照出版年代排序，同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也按照出版年代排序，原本和译本同一出版年代的，原本在前，译本在后。著者不详的按照题名（有同一题名的译著则按照统一题名）排序。书后附题名索引和主题索引，均按字母顺序排序（首冠词除外），并指向顺序号，其中题名索引包括正题名和统一题名，题名较长时在可区分不同题名的情况下适当省略。全书内容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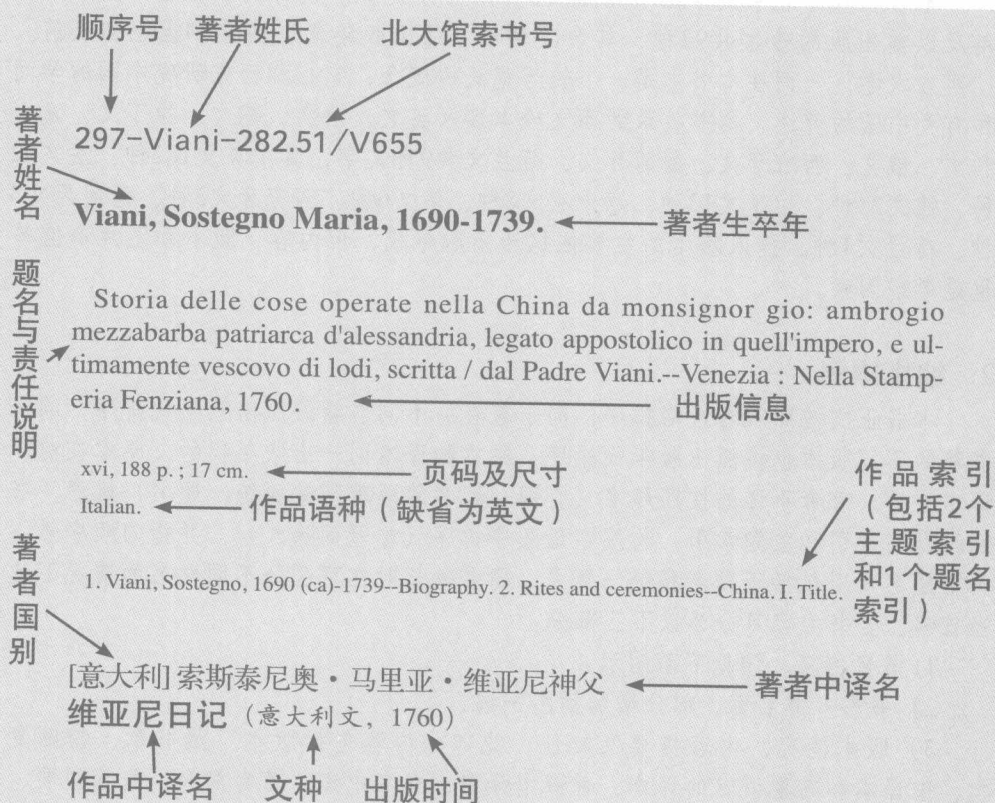
1) 书目信息。详见下面图示。

2) 书影。书名页，部分增加插图一幅。

3) 版本情况、内容提要及其他。此部分内容包括版本、藏书章、馆藏复本、中译本和其他语言的译本、著者中译名、书名中译、著者简介、内容提要、插图、北大图书馆索书号等信息。著者名和书名的中译，参照《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荣振华著、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近代来华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国家图书馆西文善本本书目》（顾彝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等书译出，无现成中译的著者名参照《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3年）采用音译，无现成中译的珍本书名由撰稿者译出、审稿人审校。同一著者有多部不同著作的，

仅在其第一部著作内容提要中列出著者介绍。同一书籍有不同版本的，内容提要附于最后一个版本后。提要中提及的机构或个人藏书章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章”表示该珍本盖有此章；提要中提及的机构或个人藏书票如“燕京大学藏书票”表示该珍本附有此藏书票。

3. 著录样例



4. 本书的分工

策划和组织、标准和体例、全书统稿：张红扬

英文提要撰写：张红扬 蒋刚苗 张丽静 于玲玲 王浩 郑心闲 郭晖
 邹新明

审稿：王立新 张红扬

法文提要撰写：邹新明 吴天岳 郭晖